

19.05

08



1988

历史资料



《澄海文史资料》第二辑目录

澄海侨乡概叙……………林凤 陈锡波（1）

苏君谦先生事略……………信 联（13）

“我想念中国的光明”

——记“马华文学”作家王君实……………有德 朱钊（17）

樟林沧桑录（中）……………李绍雄（22）

樟林乡南社港口·天后圣母庙忆述

——及当局对文物之进行……………泰国·汇编（32）

“南社港”与“红头船”……………〔泰国〕陈府弼（38）

隆都前陇乡·姑母宫史话……………〔泰国〕林特梅（40）

天后的由来……………陈文惠（43）

喋血国门御虎狼

——追记抗日英雄陈序明事迹……………陈亿琇（46）

翁万达的父母《合葬圹志》及其发现……………郑智勇 彭妙艳（53）

澄海书画家史传撷拾（二）……………蔡仰颜（61）

剪纸之花——李知非……………李伯勤（64）

澄海苏南的汉剧……………李德润（67）

“澄城阳春国乐社”史话……………陈德远（72）

澄海广场舞蹈又一奇葩——鳌鱼舞……………周镇昌（76）

民间谜社“四并斋”……………张哲源（80）

张世珍及《潮声十五音》……………张介周 张卓伦（82）

著名音韵学专家——李新魁教授……………林伦伦（87）

编者·作者·读者

澄海侨乡概叙

林 风 陈锡波

海外有了华侨，国内就会出现侨乡。所谓侨乡，按字面解释是华侨的家乡或侨眷之乡，这一点大家都不难理解。但侨乡这个概念，远非这种简单解释所能概括得了，它是指有别于国内一般地区的具有其自身特点而形成的社会群体的地方，它在经济和人文诸方面都具有其独特的色彩。

一、澄海侨乡的形成

一般来说，侨乡的形成，须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这个地方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移居海外，如果只有少数几个人，当然无可能在国内形成侨乡；二是国内必须有关系人，包括直系的父母或兄弟、妻儿和旁系的亲朋戚友等；三是必须有信息来往，特别是要有经济上的联系。百余年来，潮汕地区就是具备有这些基本条件的地方，而澄海县显得条件更充分，所以很早就被目为侨乡。

澄海县侨乡的形成，除了具备上述三个基本条件之外，还有其必须提及的地方，那就是一：它的侨乡形成历史较本地区其他各县长远，远在清康熙中期，澄海县樟林港海运贸易兴起，以樟林为中心的邻近各乡随船出洋谋生的人渐多，从而使樟林地方初步出现有侨眷，算起来到现在已近三百年。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政府允许商民领照到暹罗（今泰国）购运大米，樟林港海运贸易因是大见繁荣，货船往来频繁，出洋的人更多，樟林港成为一个不合法的移民口岸（当时清政府还严禁人民下海出洋），

于是樟林之名大著。举一个例子，早在1875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上，就已印上樟林的地名，海外寄来的批信，只要写上“中国樟林”，就可送达，说明樟林的名字早在19世纪中期以前就名闻世界。樟林可以说是澄海县、也可以说是潮汕地区最早出现的侨乡。不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移民海外是属非法，家中人无以为生冒险出洋谋生是不敢张扬的，寄回一点钱也属暗中传送，所以侨乡特点还不显著，那时还没有侨乡之名。澄海侨乡的形成，还应该是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事，1860年汕头被逼开为商埠，清政府与西方强国订立条约公开同意华工出洋，而这时樟林港也已逐步让位于汕头港，洋火船代替了“红头船”，这段时间潮汕各县出洋谋生的人，日渐增多，而澄海县有其特殊有利条件，出洋的人更多。所谓侨乡至是逐步形成，追溯起来也已百多年的事了。二是澄海侨乡的分布面最广，可以说是遍及全县。回顾近百年的历史，澄海县所有的乡镇，包括每一个自然村，可以说无处不有移居海外的人，据现在的统计资料表明，有不少自然村在外人数（包括华裔）已超过国内现有人数，目前全县13个镇，除边海地区的新溪、坝头、湾头等少数几个侨外人数较少外，其他都是有大量移居海外和在国内有众多侨眷户的。所以其分布面之广也为其他县份所少见。

上面提到的樟林，是澄海县最早形成侨乡的地方，这个地方在潮汕侨乡形成的过程中，确实带有比较典型性，所以它的侨乡特点也比较充分，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潮汕没有一地方侨乡的特点会比樟林更显著。据早期调查资料记载，本世纪20年代初期，樟林侨乡已充分形成。六、七十年前，樟林移居国外的人数已不少。当时樟林东社、南社、西社、北社、塘西、仙陇、新兴街、樟林镇等乡镇移民南洋人数平均占全乡人口的7.3%。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洋的人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如若单纯从农村主要劳动力计算，那

将是占全乡主要劳动力的不小比例，而移民户数几占总户数的1/4。若从中国农村的血缘关系来看，就几乎全乡绝大多数都与华侨沾上边。移居国外人口，主要分布在暹罗和新加坡，两地占90%以上，这有其历史渊源，也是澄海人移民的一个特点。

樟林是澄海侨乡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而澄海其他乡镇自20世纪初期也都先后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1927年秋大革命失败之后和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复员之后，由于国内政治动乱、经济崩溃，大量侨属和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苦人民涌向海外，澄海旅外华侨不断增加，澄海的侨乡特点也就更加显著。据县侨务部门调查统计资料，1987年全县总户数14万零5百多户，人口67万8千多人，其中侨户占7万零8百多户，侨属占38万9千多人，占总户数和总人口都在50%以上。

二、当前澄海侨乡概况

澄海侨乡形成的过程，也正是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所以侨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社会形态的产物。旧社会悲惨的“劳力输出”就是其特征。这种情况一直到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才出现质的变化，侨乡社会的性质随人民政权的诞生而跨进一个新的阶段，它的主要依据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作为人的尊严得到确认。华侨不再是可怜的“海外孤儿”，侨乡不再是受侮辱的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市场，澄海侨乡自然也不会例外。不过，解放以后，由于较长时间的“左”的思想的干扰，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的华侨政策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于是在侨乡出现了不少波折，当然也挫伤了广大华侨和侨眷的积极性，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各项正确的华侨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侨乡才出现了新的面貌。

澄海县侨乡当前的基本情况，可用几句话来概括：政治路线正确、经济发展迅速、教育事业兴旺、社会秩序安定、侨胞回国

探亲络绎不绝、侨资投向生产建设、侨属走向自力更生。从各方面资料以及很多人的直接体会，都有不少事实可以说明上述情况。而最值得一提的是绝大部份的侨属的生活已解决温饱问题，其中一部份已从温饱型逐步向小康过渡。

澄海侨乡解放三十八年来，虽然已没有象过去旧社会一样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口向海外移民（从1950年至1985年的三十六年中，澄海县出国的人数据统计共有14538人，平均每年还有403人），过去有人以为移民海外基本中断了，华侨关系必然逐渐减少，侨乡特点必然逐步减退。但事实并不如此，这还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新的移民虽然不多，但老的移民在海外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华侨华人社会，而且他们的后代不断蕃衍，所以国内的侨属依然非常多，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依然是一条紧紧的纽带在两头维系着，侨乡的特点随着国家的经济开放政策而比过去更加显得鲜明。加上各项华侨政策包括确认侨改户政策、侨房政策、归侨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归侨、侨眷的各类冤假错案都先后得到落实，所以侨乡的面貌确实起了极大的变化。目前澄海侨乡，出现了下述几个“多”：华侨华裔回乡探亲旅游多、兴学育才多、举办公益事业多、投资生产多；还有出国探亲旅游也多，这几个多配合当前国家的开放政策、搞活经济，给侨乡增添了更光辉的色彩。（所谓“多”，当然是相对而言，也是从澄海的人口平均数与其他侨乡县人口平均数的对比而言，而不是指绝对数字。）现在将1979年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逐步实施以来，澄属海外华侨华人以及旅居港澳同胞回乡观光、探亲、旅游以及澄海县群众和干部出国或赴港澳的情况分述如下，以窥见当前澄海侨乡的活跃情况。

自1979年起至1987年止，旅外澄属侨胞和旅港澳澄属同胞回国观光、探亲旅游、洽谈生意的人据统计达11万5千多人次，其中团队数255个，人数6554人。（这个数字不包括在汕头市登记

而順便到澄海探亲旅游的人)

有来有往，发挥侨乡特点。近十多年来除有大批侨属和港属赴国外和港澳地区探亲旅游外，自1984年至1987年，澄海县人民政府有关单位也派出代表团39个202人次前往泰国、新加坡、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扎伊尔、香港等7个国家和地区考察商业、工农业，洽谈贸易、推销产品、参加技术培训、引进设备等。如此友好的频繁来往，在澄海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至于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捐资兴学育才、举办公益福利事业、投资生产等，对祖国和家乡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就不再一一举例了。

三、近百年来澄海侨乡的经济结构及其变化

人们都认为侨乡有其特点。特点表现在什么地方？主要是表现在经济方面。因为侨乡有侨汇收入，一般来说是流动资金较充裕，社会游资较多，相应也促使商品经济较活跃。但近代中国长期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方式是以小农业自然经济为主，这种经济结构制约着侨汇资金的运用，使它越不过半封建半殖民地小农经济的格局，也即是落后的、停滞的经济状态长期扼住侨资的活力。过去小额侨汇除了贍家糊口，大额侨汇除了置田产（封建性投资）、建自用屋宅之外，派为其他用场就很少了。这就是旧社会侨乡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结构，澄海侨乡当然也跳不出这个圈子。不过，社会毕竟是前进的，侨乡的经济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近百年来澄海侨乡经济结构的变化，基本可分为五个阶段来叙述：1. 辛亥革命前；2. 1912年民国成立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3. 抗日战争时期；4. 抗战复员至解放战争时期；5. 解放后1950年至现在。

1. 辛亥革命前，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这段时期是清末年代，澄海侨乡已基本定型，不论是“自由移民”或“契约移

民”，都陆续不断有成批出洋，华侨寄回的款项，已在家乡的经济上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段时期侨汇的趋势是逐年增多，据汕头侨批业的估计，澄海县每年侨汇的收入自19世纪末的一百数十万元（大洋银）到20世纪初的数百万元。这段时期的侨汇是赡家侨汇为主（小额的、消费性的），而比较大笔的则是置业侨汇（置田产和兴建屋宅），也有少数投资于商业经营（主要在汕头和澄海县城，当时汕头还隶属澄海），直到20世纪开头，才开始有投资于工业企业者（以澄海城高氏家族的高绳之为代表，他当时在汕头创办自来水公司，和开明电灯公司；在澄海城创新型布厂等），但都是属于初创，规模也不很大。这段时期，澄海地方的经济结构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已是相当深化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小农业经济，侨资的流入虽然对地方经济起了一定的繁荣作用，但毕竟不能突破中国社会的经济格局。当然，对地方本身来说，侨汇确实起了挹注的好处，象澄海这样一个耕地严重不足的县份，其经济情况在当时比其他一些县份还好些，主要就是侨汇起作用。

2. 民国成立（1912年）至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时期。这个时期是澄海侨乡经济进入发达时期（整个潮汕侨乡基本也同样），其表现为：①侨汇额数不断增长。据侨批业估计，本世纪初潮汕地区的侨汇每年有数千万元（大洋银，下同），进入20年代，已超过1亿元；以后保持在1亿几千万元之间（澄海侨汇据估计约占这个数字的14%）。侨汇之所以持续增长，首先是赡家侨汇不断增加，因为出洋的人数在这段时期急剧增加，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和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两次高潮，澄海人移居国外成倍增长。其次是置业侨汇在这段时期是波浪式上升，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发生战事，东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反而有所发展，东南亚各地有不少华侨在这个时期赚了钱，于

是各乡镇殷富侨户多起来，纷纷汇款回国购置田产和建筑厝宅。澄海县最具代表性的置业大户有隆都镇前美村的陈慈黉家族、澄城镇的高满和家族、樟林的蓝全升家族等，他们除了置有大量田地产业之外，还都在家乡起建大量屋宇，而且规模极其庞大堂皇。至于次一等的大、中、小置业户，就不胜枚举，澄海有不少由华侨兴建的“新乡”和“大厝”，大多数出现在20年代前后的这段时期。②侨汇除用于赡家和置业之外，这段时期已有较多的投向工商业和城市建设的房地产业，也有部份投资于交通运输业。（20年代开始，汕头与澄海分治，但澄海华侨的企业性投资还是大多集中于汕头市，在澄海县城镇只有一些商业性投资，数额也不大。原因是旧中国政局动荡，地方不平靖，加上经济建设条件差。）澄海有代表性的侨商大户如陈慈黉利、陈炳春等商号，在汕头都有较大量的投资，但主要是集中在贸易、银号以及房地产方面，至于开发性、生产性的工业投资则为数极少。究其原因，是当年中国积弱、政治不修、科技落后、关税不能自主、洋货倾销、农村手工业破产、民族工业无法发展所致。事实上当年中国的外贸是长期入超，加上历次军阀政府向洋人借款，国家财政亏空，侨汇一个主要作用是用来弥补国家的国际收支。而转到侨眷手里的资金绝大部份都是作为消费性的资金花掉，要望用来从事发展生产、振兴工业，就当时的客观环境是办不到的。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总的来说，澄海侨乡经济还是一个有发展的较稳定时期，给澄海地方经济增添了不少的活力。

3.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整个中华民族进入生死存亡的关头，整个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社会运作被打乱了，社会经济结构也大大改观。整个潮汕侨乡受到极大的冲击，澄海的情况更严重，因为由于地理、历史上的关系，受冲击的程度比其他县份还剧烈。

抗战开头，因为战火还未波及粤东，外国商船还可进出汕头港，潮汕侨眷与海外亲人的讯息和经济联系，还未完全中断。不过由于战事已起，正常状态已被打乱，侨汇大大减缩，除了部份贍家侨汇通过特殊途径稍有流入以外，属于投资、置业的已几乎完全中止。1939年6月，汕头沦陷，澄海首先遭受战火，情况又为之一大变，侨乡经济格局，至此不能再维持。不过汕头沦陷之初，市面虽然混乱，但汪精卫的南京伪政权还未粉墨登场，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国币还可继续流通，而澄海县也只局部沦陷，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机构仍然存在，太平洋战争未爆发，汕头港还有英国或其他欧美国家的轮船不定期进港，侨批业商人通过非正常渠道继续还有少量贍家侨汇流入，侨眷虽然面临着很大的威胁，一部份人还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然而就在此时，市镇街头和农村已开始出现饿殍，其中有一部份就是贫困的侨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事爆发，日军南进东南亚，海路完全阻塞，侨汇也彻底断绝，侨乡的大灾难降临了。这时的澄海，是处在战火交叉地带，县境先后沦陷，日寇、伪军和打着正统政府军招牌的地方部队竞相摧残，加上1943年的大旱灾、大饥荒，侨乡已疮痍满目，众多劳动人民受害。而无地或少地、贍家侨汇又断绝的侨眷，受害更烈，不少人被逼逃荒，不少侨属出现妻嫁于卖的人间悲剧。举几个例子：澄海县冠山村，据抗战前调查原有人口9886人，其中有华侨关系占一半以上。沦陷初，被日寇杀死37人，被强奸19人；几年之间，饿死1283人，逃亡334人，绝户194户，到复员时全村只剩下3668人，仅存37.1%。还有澄城镇的东湖村，也是澄海县一个重点侨村，抗日战争前近万人口，最后只剩下2900多人，仅存29%；该村邱厝，原有800多人，约150户，由于侨汇断绝，农村经济破产，被迫拆掉厝屋20多座350间，衣物卖尽，只好逃亡，卖儿卖女，饿死绝户比比皆是，单饿死就有

200多人，逃亡福建各地60多人。属于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当年澄海侨乡惨状，可见一斑。抗战中期以后，澄海侨乡的经济结构已面目全非，不过却有一点还被保留着，那就是地主占有制的封建土地关系并没有改变。敌伪双方为维护其法西斯统治，当然也不会去破坏这种制度，所以在国内的地主华侨或华侨地主（这是解放后的叫法，所谓地主华侨是指那些移居海外之前家庭已是地主；华侨地主则是指移居海外之后，赚有钱财，寄回家乡购置田地的人），能够继续保存其土地所有权（当然在民族矛盾深重的情况下，他们一般也饱受战祸之苦）。如果说那段时期侨乡的经济结构还有什么保留的话，可能就存有这一点，即有地的华侨和侨眷仍领有其土地，在战火比较平静的情况下，他们多少还能够靠收取地租过活。至于广大无地或少地而只靠侨汇赡养的小侨户，就只能挣扎在死亡线上了！

4. 抗战复员至解放战争时期。自1945年9月日本侵略者投降至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时间虽然不足5整年，但由于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全面崩溃，侨乡经济也不能例外而随之大崩溃。这段时期，可说是海外华侨和国内侨眷经济损失最惨重的时期。原来抗战胜利了，全国人民正想从此走上建设一个富强新中国的道路，可是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政府，却一心一意实行反共，当时在美国的支持下蒋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这样一来，国统区的政治、经济都出现了空前大混乱，通货膨胀迅速陷入恶性大发展。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开始华侨汇款虽然能够恢复，侨乡重新出现了生机，但情况如昙花一现，立即又陷入另一个惊涛骇浪之中。货币贬值，如江河直泻，势不可挡，首先是“国币”不能维持，继之以“关金”；又不能维持，继之以“金圆券”；最后无可奈何出了一种“银元券”来煞尾。这种情况意味着海外华侨汇款回来，先是

未抵家已去掉一大半，后来发展到几成废纸。这段时期，侨乡经济从原来希望的一线生机变成黯淡无光。货币大贬值加上官僚和奸商狼狈为奸，积压和截留侨汇，使华侨所蒙受的损失和侨眷所受的灾难，难以估量。这段时期在潮汕出现的情况是大批侨眷和城乡大量劳动人民涌向海外，形成了地方移民史上的最后一次大高潮。这段时期整个中国的经济是由“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所控制，封建的地主占有制仍然保留，加上帝国主义侵略资本的渗透，所以中国人民是更加沉重地压在“三座大山”之下。侨乡的经济逃不出带毁灭性的冲击。

5. 解放后，1950年至现在。1949年末潮汕地区解放，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布成立，人民欢庆新生，澄海侨乡人民当然也欢欣鼓舞。解放了，国家整个社会一度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最根本就在经济基础的改变。在这种大改变中，整个侨乡的经济结构也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带根本性的改变：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侨乡的经济结构和全国一样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特别通过了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地主占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过去的华侨地主同样不能占有土地。革命必然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且也必然会产生波折，潮汕侨乡在土改运动中，也出现过“左”的倾向，挫伤了部份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的热情和国内侨眷的积极性。但通过这个运动，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社会效应，即侨眷户对侨汇的依赖性比前大大降低，过去有不少不劳而获的侨眷通过劳动改造而成为自食其力的人；②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采取正确的侨汇政策，实行“原币汇款”（主要是港币），使侨汇不因国内币值波动而波动（特别是解放初期，币制未稳定，这种波动的情况还很严重），侨眷户不致遭受重大的损失；这种“原币汇款”维持至今达四十年，

证明在安定侨汇上是行之有效的（由于国内经济体制的原因，造成外汇牌价与实际比值逐渐拉长距离，十余年来对正常侨汇的流入，当然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人民政府对侨汇保值方面是不断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如近年开办的外币存款，使侨户不遭损失，就是一个显例）；③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旧社会的置业侨汇（主要买田地）中止了，而在1979年国家实行开放政策以前，投资侨汇也几乎没有了，只存下贍家侨汇一项（据统计，从1950年至1986年，澄海全县收入侨批汇款2亿64万多元，平均每年约800万元），这笔侨汇几乎都是贍家侨汇，虽然为数不是很多，但对地方经济也起了一定的挹注作用。而同样是贍家侨汇，跟旧社会又有所差别，旧社会是纯消费性的，除了维持生活所必需之外，有不少一部份是花于吃喝嫖赌和讲排场之类，新社会这种情况大大减少了。同时侨眷户也多已从事劳动生产，所以有一部份还用于小额的生产投资，如置农具、买化肥之类，也有部份投于农村信用社转化为生产资金；④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落实各项华侨政策以后，一改过去封闭式状态，侨乡经济面貌步步改观，侨资的流入出现了几个多：旅游探亲侨资流入多、捐赠兴学和举办公益事业侨资流入多、“三来一补”投资流入多。特别是“三来一补”生产性外资的投入，使侨乡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这和30年代以前的华侨私人投资已大不相同，规模大，性质也有别，现在绝大部分是作为外资引进的有偿投资，和30年代以前作为私人回国创业，没有得到特定的法律保障完全不同。）

澄海侨乡经济到了最近10年，在开放、搞活的特殊政策推动下，才真正起到了质的变化，下面的数字，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986年，全县乡镇企业有5599个，就业人数6万多人，其中从事对外加工的企业有125家，职工2万多人，签订合同500多个，

完成工缴费900多万美元，银行纯收入700多万美元，有关客户400家。自国家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全县共签订合同2千多宗，引进设备5900多台套，为来料加工的企业兴建厂房7万多平方米。目前毛织加工能力为800多万件，服装为1200多万件。澄海对外加工业正在继续发展中，外商（主要是侨商、港商）投资合资的企业也在发展中。澄海侨乡社会已出现前所未有的真正繁荣，侨乡人民的生活将会逐步得到改善和提高。

苏君谦先生事略

信 联



苏君谦先生遗像

先生名益仁，字君谦，以字行，祖籍澄海县信宁乡，一九一〇年六月七日出生，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在泰国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先生十五岁毕业于信宁乡毓秀小学，复于东湖乡蔡芳舟老师处进修古典文学，历时三年，奠定国学基础。十八岁赴泰国，进华侨专科学校，嗣后毕业于圣彼得中学。先生在家乡期间，目睹土劣横行，鱼肉乡民，深恶痛绝，激于义愤，遂同志趣相投的同学及友人詹雨庵、郭子纲等组织“郁联社”，

随后创办晨光小学，并亲自义务执教。

先生富正义感，爱国爱乡，抗日战争初期，深感国难当头，乃邀集同乡贤达，组织泰国潮州会馆，连任执行委员，致力侨务，积极推销救国公债，发动属下各机构人员，资助国内逃泰同胞。每逢七月七日实行素食，以提醒国人不忘国内苦难同胞，节俭捐献救国。抗日胜利后，先生在泰国主持庆祝胜利大会。随后，以中流砥柱，众望所归，出任潮州会馆第五届主席。复与郑午楼先

生领导“暹罗华侨救济祖国粮荒委员会”，发动侨胞捐款捐米，回国救济潮汕灾胞，总额三万余吨。末期还增加赈米运乡额数，惠及侨眷，深得侨胞敬佩。嗣后被选为回国监赈团团团长，回国监赈，亲至乡间慰问灾胞，奔走监察，严明公正，为时半载，曾受覆车之险，备极辛劳，深得赞誉。留汕期间，先生为利侨胞出入国之便，乃请当局，设立泰国潮州会馆驻汕办事处，一九四六年出任组织救济新侨委员会主任。任职期间，亲自接船，担保患砂眼同胞出入境，为穷苦同胞代缴纳进泰国入口费，热情帮助新侨解决生活及职业问题。一九四七年还在泰致力筹募一百多万元，为秀水乡中心小学添置学生课桌座椅及校舍修缮工程，造福侨胞，泽惠桑梓。

先生为人谦虚和蔼，公而忘私，久为同乡所钦仰，连任潮州会馆第五届、第六届、第十三届至十九届主席，前后蝉联主席共九届达十八年，中间曾任第七届副主席、第八届至十二届常务委员。在创办潮州会馆的三十九年中，一直参与会务，从无间断，在有益于侨胞的各项福利事业中，无不倡导，兼负其职。

先生热心公益，服务社会，除一直参与潮州会馆会务之外，积极进行筹建新馆址及创办弥博中学，潮州汇西山庄，主办泰华篮球联赛，泰华象棋联赛，第四届亚洲象棋赛，主持派队主席在星、港、台、马各地举行之亚洲象棋赛，主办泰华春灯大会，国乐歌剧院联谊晚会，又提倡体育运动，促进文娱，联络乡谊，并极力倡导和参与各项福利慈善机构活动，勋绩显著，遐迹同钦，先后曾获泰皇陛下御赐皇冠勋章，红十字会一等奖章，国民政府华侨褒扬状，粮食部奖章等勋猷。

先生思想进步，倾向革命，为继承和发展“郁联社”进步事业，于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返回家乡，会同原“郁联社”领导成员杨敦礼、陈作初，修建郁联社旧址，重开万发米店，同时

发展杨瑞深、杨敦仪、谢岳生等十多人为“郁联社”新社员。尔后，万发米店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联络站，许多社员在党的教育下，先后加入解放战争革命队伍，献身革命事业。

先生对人热情，乐善好施，凡故人亲友有所求助者，均莫不竭力支援，最难得者为昔年“郁联社”故友遗孤之扶植不遗余力，长期资助，直至其能自立而后止。

先生与夫人黄奕乔女士结婚四十余年，伉俪情笃，相敬如宾，报国有志，家教有方，育六男二女，皆已成才，相继荣获各种学士学位，一门俊秀，堪称模范家庭。